



火車快飛，讀書快樂

夏目漱石在一九〇八年發表的長篇小說「三四郎」裡頭，有段描述主人翁三四郎，乘坐名古屋開往東京新橋的東海道線三等車廂內，百般無聊，本來打算捧讀培根論文集，但腦海老是浮現那名昨夜同處名古屋旅館一室，又相安無事的皮膚黝黑的女子，今晨車站各分東西時竟對他說：「你真是個沒膽識的傢伙。」三四郎隨意打開培根論文集第二十三頁，儘管目光來回逡巡字裡行間，卻怎麼也看不下去，腦袋瓜空轉著昨夜女子挑逗他的畫面。懊惱一陣，索性丟下了培根，改跟對面的鬍鬚男乘客借來報紙，胡亂瀏覽一通。



報紙與旅行，在個人的體驗上，存有相似的結構。報紙集束一(昨)日之間發生的新聞，讓讀者產生優遊一日時空的親歷感，相當契合旅行者以日計程的實際狀況和身心氛圍。火車，不僅能將中央都市報紙運送地方鄉鎮，作為一種移動的空間兼行動的載(媒)體，天生就適宜旅行者在乘坐行進間選擇報紙當成車中讀物。

明治初期，新聞紙種類百花齊放、百舌爭鳴，但一般分為重視政經文化的大報，以及強調八卦娛樂的小報，乘客依循自身的教育水準與職業階層，選讀適合脾性的報紙。不過從明治二〇年代(1887~1896)開始，大報、小報彼此吸收長處，互相競合，逐漸朝中間靠攏，遂有所謂「中間新聞」的普遍化。自此無論一等車廂、二等車廂、三等車廂(上中下等車廂改稱)的乘客，透過鐵道運行的時空，接受均質化現實報導新聞讀物的洗禮。

東京新橋、橫濱鐵道開通之初，明治政府立即准許旅日英國報人John Reddie Black(1827~1880，日本名號刺屈，一八七六年十月前往上海發展，以中國題材攝影著稱)和赤井家族，在車站內(非月台)販售報紙，兼賣時刻表及旅行導覽手冊。至於在月台沿著靠站列車車窗叫賣報紙，究竟起於何時已不可考，但據一九〇二年出版的「鐵道時報」，刊出採集自各車站月台的販夫叫賣聲音，簡列如下：

- 御殿場(靜岡縣內)—要不要報紙、熟蛋啊。
- 沼津(靜岡縣內)—要不要報紙啊。
- 濱松(靜岡縣內)—有東京大阪的報紙喔。
- 明石(兵庫縣內)—有需要報紙、香菸嗎。
- 博多(福岡縣內)—有需要報紙、雜誌嗎。
- 津(三重縣內)—要不要報紙、時刻表啊。
- 郡山(福島縣內)—要不要今天的東京報紙啊。
- 一之關(岩手縣內)—有需要報紙嗎。
- 野邊地(青森縣內)—要不要報紙啊。

可見隨著鐵道運輸的突飛猛進，中央都會報紙的勢力源源不斷深入日本全國各縣市地區，甚至穩穩佔據火車車廂此一近代首見的讀書空間。

鐵道網絡展延，長途旅行的機會增加，報紙當然已經不能夠滿足車中讀書的需求，雜誌於是躍居僅次於報紙的第二大量車中讀物。標新立異、各出奇招的眾多明治時代雜誌裡頭，一九〇一年創刊的時事漫畫諷刺雜誌「滑稽新聞」(先發行月刊，後改半月刊)，販售手法突出。該刊設定火車乘客為主要的讀者層，開創雜誌同業的風氣，委託月台販夫，沿著靠站列車車窗叫賣，喊出自己的雜誌名號：「便當、牛乳、滑稽新聞」，銷售效果奇佳，同樣的手法擴展至全國各大車站炮製，刺激發行數量高達每月八萬份。

今天日本的觀光資訊非常發達，可以在每縣市車站輕易取得當地的旅遊導覽。其實遠在明治時代，刊載紀行文和旅行資訊(含景點介紹、交通時刻表、地圖)的導覽手冊，便已成爲鐵道車中讀物的第三大類。

一九〇七年出版的「旅行者寶鑑」，諄諄提醒旅客務必要在行李箱內收攏八項必備物件，其中就包括導覽手冊：1.替換外服2.內衣褲、手帕之類3.內服外用

夏目漱石不經意寫下的火車車廂內，類似三四郎那樣的讀書場景，今日雖屬司空見慣，但值得矚目的是，透過三四郎做爲一個「車中讀者」的徵象，清楚標誌了近代誕生的鐵道，與讀書行爲的密切關聯性。

明治維新之後，交通工具的急速變革，連帶使得日本的出版流通和民衆讀書生活，產生急速的變化。尤其延伸至全國全境的鐵道網絡，一方面形成印刷媒體的全國性流通動脈；另一方面，搭載鐵道網絡的順風車，創造出全國規模、嶄新的所謂「車中閱讀」的讀書文化。換句話說，鐵道不僅作爲承載印刷媒體的運輸工具，本身同時作爲一個閱讀場域——也就是一個移動的媒體。

旅居紐約的德國文史學者兼作家希維爾布奇(Wolfgang Schivelbusch)指出，歐洲「車中閱讀」的產生，關鍵時點即在於馬車旅行轉變至火車旅行。曠日費時的馬車旅行，顛簸的路途特別適宜旅客談話聊天。但火車旅行的過程，車站與車站間的乘客更迭頻繁，比馬車更快的速度又隔絕了窗外風景，乘客彼此之間的談笑風生消失，排遣無聊時間的手段，於是被閱讀行爲取而代之。「鐵路此一新型的運輸方式，深刻改變旅客間的相互關係之後，閱讀，遂成爲最自然而然的產物了。」

必須留意的是，日本跟歐洲不同，並沒有先後順序顯著的「馬車文明」、「火車文明」的區隔，而是人力車、馬車、汽船、火車同時並駕齊驅，但論起對於讀書文化的影響力，前三者不過是零星、線段似的而已，絕無法跟全國性的鐵道網絡相比擬。

明治維新(1967~)僅只歷經第五年，一八七二年十月，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譽爲人類歷史上的奇蹟——東京新橋、橫濱之間鐵道正式營運。再兩年一八七四年，大阪、神戶鐵道開通；一八七七年大阪、京都鐵道加入行列。

儘管票價昂貴(試舉新橋橫濱鐵道爲例，上等車廂一圓一二錢五厘、中等七五錢、下等三七錢五厘，而下等車資足足可以購買當年十公斤白米)，運輸績效蒸蒸日上。一八七三年一月到十二月間，新橋橫濱鐵道載客數一四三萬人次。殆及一八八七年至九七年間，鐵道網絡飛躍發展，八七年全國載客數八四八萬人次，九七年約莫夏目漱石筆下的三四郎時代了)，竟衝破一億，高達一億四三〇〇萬人次。除了旅遊觀光產業的蓬勃效應，也帶動了「車中讀書人口」的激烈成長。

車中讀書的對象——車中讀物，最爲普遍的要算是報紙了。三四郎放棄了知性的培根論文集，改而向鄰座乘客借讀報紙，即屬顯例。爲甚麼報紙會成爲車中讀物的首選，這種現象跟報紙的特性有關。

簡白

藥劑4.盥洗用品、梳子、香水等5.筆記本、信紙、鉛筆、小刀6.郵票、便條7.旅行導覽、名勝導覽等手冊8.愛讀書籍、紀行文集。

火車旅行帶動導覽手冊興盛流行，舉例來說，一八九四年問世的「汽車(火車)汽船旅行案内」月刊誌，兩年後全年發份數多達一八萬，一八九九年更衝高至二十萬份。其中百分之二十集中於東京，另外百分之八十銷往其他縣市。

明治時代誕生的新型讀書文化「車中讀書」，在讀書史進程具有獨特的性格和意義。車中讀書基本上屬於個人的私密行爲，但這種私密行爲又與書房內的個人讀書活動顯著區別。車中讀書，這種在衆人矚目視下的公共空間內進行私密的個人閱讀，透過整個明治三〇年代(1897~1906)的鐵道網絡擴張，蔓延至日本全國各

書與金魚

◎Zoe 佐依子

也許，最近，會有人從社群網站上尋找你。他們是你多年失聯的朋友(有失聯這回事嗎?)，或是以前在小學時的同學(他們也忘了曾欺負過你)。然而，寂寞的現代人，只要有人將焦點放在身上，常會忘了我是誰，毫不考慮就按下「接受承認」的選擇。花了一些時間相聚之後，發現彼此根本是兩個世界的人。當然，也有美妙的例外。

但是，有一位朋友，你無論將他忽視多久，甚至將他完全忘了，讓他沾得滿身灰塵。當你有一天不小心再碰到他，或是突然想到他還有「可利用」之處時，他還是會默默的幫忙你，沒有怨言，這位朋友就是：「書」。

二〇一二年的書香節，英國送出去一百萬本書。這些書是精選出來的經典文學，像狄更斯的《雙城記》，或是當代作家石黑一雄的《長日將盡》這類的書，各送四萬本。二十五本這類的書，加起來共一百萬本，在英國圖書館、劇院、書店、文化中心等地由藝文人士來發送。而愛爾蘭、德國與美國也響應了這個活動，共送出兩百五十萬本書。

記得第一次住在英國東岸的民宿時，白天音樂節活動很多，而晚上一片安靜，面對著大海，自然而然看到屋主人在房間的一落書櫃。拿起最厚的一本(因爲三個月不是短時間)，竟然是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每晚多少看一點，而看到其他的屋主(都是英國人)，他們都從倫敦準備了自己想看的書。音樂節結束，大家就將書當成禮物送給彼此當紀念品，或是將書留在民宿，讓下一位房客閱讀。

維也納的小說家褚威格在他的自傳《昨日的世界——一位歐洲人的回憶》中，也有一個章節描述他在唸中等學校時，幾乎所有的新鮮知識都是跟同學下課後到咖啡館學的，因爲咖啡館的主人訂購了巴黎、倫敦最新的文學雜誌，刻意讓咖啡館成爲藝文人士「想來」的地方。而這群在學校受到刻板教育的年輕人，閱讀這些書簡直就像在天堂似的。褚威格也說，他之所以會成爲創作小說家，這個獨特的「咖啡館」閱讀經驗是促成的一大原因呢！

剛剛結束的法國總統大選，在競選期間，民衆觀察在乎的，除了候選人的能力，他們還想知道將來的領導人有沒有閱讀的習慣；攝影記者「虎視眈眈」的是總統候選人手上拿的是那本口袋書(livre de poche，隨時可閱讀的書)，而前任的總統薩科奇，他最近手上拿的是法國人民喜歡的奧地利作家褚威格的小說呢！

說到總理，去年日本大選，野田佳彥先生在民主黨競選演說時，引用了詩人書法家相田光男(1924-



1991)的一句話：「泥鰍是假裝不成金魚的」，來比喻自己要是當選之後，一定會謙虛的以最實在的自己來當首相。就這樣一句話，隔天位於東京鬧區的相田光男美術館，擠進了一千五百人，不但比平時來參觀的人多一倍，紀念品店的東西與書籍也被搶購一空，連當初出版相田詩集的出版社讀者要求連夜印了五千本詩集。還有野田先生選上了首相。

這一切讓我想到一八七三年時的法國。受到普法戰爭的摧殘之下，一位叫都德(Alphonse Daudet, 1840-1897)的作家在他每星期一的專欄裡，不停的將法國人的心聲寫成故事，來撫慰人心。有一篇最有名的就是我們在小時候在課本裡都會讀到由胡適先生翻譯的《最後的一課》。那位語重心長的老師，要學生珍惜學習的機會，現在想想還真是令人動容。

現在您也可以聽著安穩的巴哈無伴奏，閱讀任何一本隨手可得的書，也許哪天您也會遇見那條泥鰍，或是金魚呢！

不敢奢望您看完這本書之後，會馬上想出門去談戀愛、看電影、買書，或任何感性的舉動。

但我只想跟您說，這些文章裡提到的每件事都是我十分在乎，而且在乎到一個不跟別人分享會發狂的地步，所以最後才訴諸文字。

衷心感謝親情、友情。
Bonne chance et bon courage!!!

以詩為史

一序《蠹餘集》

◎余英時

我生平沒有養成寫日記的習慣，現在竟想不起來初識陳穎（字穎士）兄是在何年了。他有一首〈神武曲〉（收在第二輯），是集中傑作之一，我當時即曾有過先睹之快。他在此曲的〈序〉中說：「一九五九年己亥秋，客麻州劍橋，衛挺生前輩為縷述徐福入日本建國始末，以原著《神武開國新考》見贈。」據此，可知我們第一次見面大概是一九五九年的秋季。但是另一件事我卻記得很清楚：他認識先父協中公在前，認識我反而在後，這件事也和衛挺生丈有關。先父與衛丈是老朋友，常在哈佛燕京圖書館相遇，每遇必長談，每談則必及徐福。這是因為衛丈不但已發表了兩本中文專著，而且還正在撰寫英文本，因此和哈佛的日本史教授賴世和（Edwin O. Reischauer）展開了反覆的論辯。這是當年劍橋轟傳一時的一大趣事。穎士便是在圖書館中同時認識二老的。

穎士後來告訴我：他和先父交談之後，即覺親切，因為他發現先父在抗戰前兩年曾在開封河南大學擔任過文史系主任的職位，因而頓生「同鄉」之感。我則告訴他，我是在開封第一次上小學的，而且至今記憶猶新。他聽了，更是高興。穎士和我可謂兩代交情，在我的友人之中是僅有的。

一九五九年穎士已考過博士試，從印第安那大學到劍橋來是為了利用哈佛燕京社的藏書，以完成博士論文的撰寫。他的導師柳無忌先生在中國文學和西方文學兩大領域都有很深的造詣；柳亞子先生是他的父親，因此他擁有家傳的中國詩學；他很早便獲得了耶魯大學英國文學的博士學位，因此在歐洲文學方面更是出色當行。穎士〈賀柳無忌師樂休七律四首〉之二的前四句說：

風騷南社數家珍，記取全唐摘句新。
學涉西洋光藝苑，書窺東觀指文津。

這是對柳先生的忠實描述，一點也不誇張。穎士的文學背景和取向恰好和柳先生極其相似——自幼即浸潤於中國詩詞的傳統，但畢業於台灣大學外文系。他在美國竟列身於柳先生門下，真是一種十分巧合的文學因緣。穎士最後選擇中西詩人的比較研究為論文題目，更使人起天造地設之感。我相信他們師徒兩人當時必有



「相視而笑、莫逆於心」的欣悅。

我清楚地記得，穎士最早和我談天，幾乎每次都涉及李賀（字長吉，七九一～八一七）和法國詩人波德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一八二一～一八六七），也就是他的比較研究的具體對象。我對於李賀還略知一二，對於波德萊爾則一無所知，祇因他談得興高采烈，我的興致也被引起來了。不過我當時剛剛讀過錢鍾書《談藝錄》，錢先生在書中討論了李詩的若干特色，如「長吉賦物，使之堅，使之銳」之類，並提到波德萊爾和其他兩位西方作家，以見「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又如長吉論藝，主張「筆補造化天無功」，而波德萊爾也持「調劑自然，功奪造化」之說。我向穎士提起這一點，他很高興地說，《談藝錄》正是他靈感來源之一。從此我們之間又增添了一個常常碰到的共同話題。

但穎士雖富於學而不是學究，他和我討論詩學主要是在我們初交時期，而且是由他的論文引起的。後來我們相知既久，談鋒便自然轉向彼此都覺有趣的題目，很少再一本正經地作論學語了。穎士和我有不少共同的愛好，如京劇、雀戲、清談、詩詞寫作等則是其中最具有吸引力的幾項。因此我們在治學之暇相聚的機會比別人更多。

寫到這裏，讓我略略回顧一下我們當年的一些課餘的消閒活動。在悼念張光直兄的一篇文章中，我曾特別談到一九六〇年起，哈佛人文領域的中國研究生組成了一個定期研討會，大家輪流作學術報告，然後共同討論，往往爭辯得很激烈。（見〈一座沒有爆發的火山〉收在《情懷中國》，香港，天地圖書公司，二〇一〇年）但穎士對這一類學究式的集會，興趣不大，最多參加過一、二次便裹足不前了。他寧可和三、五好友不拘形跡的稱心之談，而不願受正式會議的拘束。

穎士的詩人氣質特別表現在「從吾所好」的精神上，興致一起，他可以飲酒高談，直到東方既白；他曾如此渡過了不少的長夜。但令我難忘懷的則是他對京劇的深好。大約是一九六九年前後，經濟學家劉大中先生從康乃爾大學到哈佛來訪問一年。劉先生是一代京劇名票，曾多次登臺。更難得的，他是一位京劇全才，行話叫做「文武崑亂不擋」。他告訴我們，他從六、七歲開始聽戲，便是連著鑼鼓點子和胡琴、二胡等一齊聽的，所以至今還有好幾齣戲，他都能從頭到尾將所有音唱背誦出來。不用說，他的一手胡琴也拉得出神入化，

在劍橋住定以後，他便和楊聯陞師、趙如蘭教授張羅著要組織一個京劇俱樂部。楊先生也是菊壇的一位業餘名宿，早在中學時代便和趙榮琛（後來成為程派傳人）等一起學戲。不過他祇唱不做，特別愛好言菊朋的唱腔，功力很深。一九五七年他訪問香港，曾在廣播電台上和名旦章遏雲合唱「三娘教子」，轟動一時。趙如蘭上承元任先生的家學，正在哈佛講授中國音樂史，對於這一天賜良機更是特感興奮。俱樂部便這樣成立了，大致是每隔兩星期在週末聚會一次。

當時穎士在耶魯大學任教，我告訴他劍橋成立了這一俱樂部，他欣喜若狂，立即表示一定參加。如果我的記憶不誤，一九六九～七〇這一學年之內他為了京劇聚會而趕來劍橋，先後不下二十次。從耶魯到哈佛駕車至少需要三小時左右，穎士必在星期六中午趕到，有時在劍橋過夜，但常常是當晚趕回紐黑文（New Haven），興致之高，由此可見。穎士對京劇的造詣很深，無論是做功、唱功、道白或尖團音，他不但都下過功夫而且還十分講究。在聚會中他和劉、楊二老之間往往有深入的討論，讓我這個門外漢大開眼界。我的京戲是從留聲機台上名角的表演了。追憶起來，抗戰勝利以後我在瀋陽、北平兩大城市，聽過的戲一共不過六、七次罷了。也許由於是同姓的緣故，我最喜歡的是余叔岩那種蒼涼和低迴往復的韻味。余叔岩留下的十幾張唱片，我是聽得很熟的，但卻從來沒有隨著胡琴伴奏而練唱過。因此一九六九～七〇年度的哈佛京劇俱樂部為我提供了第一次認真學唱的機會；在這一學習過程中，穎士的指點對我有很大幫助。我最初對於板眼有些把握不住，常發生荒腔走板的情況，多虧穎士在旁為我提示，才慢慢地上了路。又因為我是南方人，對所謂尖團音完全分辨不出來。（據說北方人，特別是山東人，尖團音與生俱來，根本用不著去學。）穎士也很耐心地為我舉例說明。儘管如此，我僅靠硬記，至今仍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我較詳細地回憶了這一段海外京劇因緣，因為這確是我和穎士數十年交游中最值得珍惜的一段共同文化經驗。當我們同時進入京劇世界之中，竟渾然忘身在何處，彷彿和中國文化從來沒有分開過。不用說，這段經驗也深深地印在穎士的心頭，下面這首七律可以為證：

劍橋高會豈無因，等是紅羊劫後身。
撥盡銀錢清夜永，歌殘驪曲客愁新。
科班戲語呼師傅，明筆論交誇好人。
最憶大郎婚宴上，阿翁猶自考遺音。

這首詩前半段點出哈佛京劇聚會的緣起和參與者的心境。當時在中國大陸上，所謂「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京劇則是受盡摧殘的重災區。我們每次在聚會中談到京劇所面臨的悲慘命運，都不勝感慨，穎士以「劍橋高會」為「紅羊劫後身」確實表達了我們的共同想法。「紅羊劫」之典尤為傳神：南宋《丙丁龜鑑》指出，過去有一千二百多年的長時期（自公元前三一五年丙午到公元九四七年丁未），每逢丙午、丁未之交國家必有厄會，稱之為「紅羊劫」。無巧不成書，一九六六，即「文革」開始之年，恰好又值丙午。

此詩第四句「歌殘驪曲客愁新」必須通過「紅羊劫」的背景才能透顯出它的整體涵義。此詩的下半段則是對於大中先生的一幅素描。最後兩句指大中先生的長子婚宴。我們都參加了這場盛會，這位劉「師傅」在席上的談論，句句不離京劇中的音韻問題，而且興致極高，我至今還記得他曾特別提到余叔岩和張伯駒有關這一方面的作品。事後我們都說，大中先生對於京劇，正

〈書摘〉

末日戰爭：終局之局

◎馬修·葛拉斯 / 著 李斯毅 / 譯

烏干達，馬辛迪鎮(Masindi)
二〇一八年七月五日

天色剛亮，便開始有人陸續抵達了。他們沿著那條通往小鎮的泥巴路而來，有人以步行的方式走來，有人則駕著車身漆了鮮艷色彩的貨車，隨著路面坑洞顛顛晃晃地駛來。他們帶著在鄉下種植的玉蜀黍、紅椒、甜薯、秋葵、蕃茄、洋蔥、葫蘆等農產品，到市場裡散放在毯子上販售。於是，每週四舉行的市集再次拉開序幕。一群警察佇立在市場旁，懶洋洋地倚著步槍，和小販們閒聊。那些從殖民時代便已設立於市場四周的商店，懸掛著早已褪色斑駁的手寫招牌，例如「巴穆吉沙理髮廳」、「誠實兄弟商店」等。店家的老闆們站在店門口，試圖藉著與那些來自鄉下的菜販們談天說笑，以便招攬他們走進店裡消費。

到了下午四點，市集時間結束，市場也跟著空了。那些到鎮上來做生意的小販沿著原路返回鄉間，商店老闆們則目送他們離開。

夜幕降臨後，原本光禿禿的紅土街道變得如墨色般漆黑。商店的燈光在亮了一會兒之後，接著也一一熄滅。



然後，那群人出現了！他們從小鎮北邊的灌木叢現身，大約有二十五人，也許是三十人，身上穿著雜役兵的綠色工作服。其中比較高瘦的那幾個人，年紀大約十八、九歲或二十出頭，其他的則還是小孩子。他們手裡拿著彎刀與棍棒，較年長的那些還帶著衝鋒槍。

馬辛迪飯店是一九二〇年代殖民時期的建築物。飯店的酒吧裡有幾個西方人正在喝酒。馬辛迪鎮向來對觀光客沒有多大興趣，因為來到馬辛迪鎮的旅客，通常只是為了前往位於西北方六十英里外的莫奇森瀑布，或是在造訪過莫奇森瀑布之後準備返鄉的過客。飯店酒吧裡的這些酒客之中，有好幾位是美國「人人健康醫療慈善

團體」(Health for All)的成員，他們協助美國政府來到馬辛迪鎮的醫院服務。

那群從灌木叢裡出現的人，目的地並不是馬辛迪飯店，因此他們靜悄悄地走過飯店，隱身在暗夜裡的街道中，絲毫不理會從飯店酒吧裡透出的燈光或傳出的談笑聲。這群神秘客裡有一個人熟悉小鎮的路況，因此由他負責帶領其他人往前走。他們選擇最陰暗的街道行走，並且刻意避開警察局。他們穿過市場、走過市場四周那些已經關門的商店。最後，他們終於停下腳步。

街道的另一頭就是醫院的圍籬，在圍籬的入口處懸掛著一顆燈泡。圍籬內是一排外表看起來像軍營一般的病房，在黑夜裡靜謐無聲。病房後面則是外國醫護人員的宿舍。

那群人當中幾個帶頭的傢伙開始交頭接耳，其中一人先跑到街上觀察四周的狀況，並且確認圍籬門口沒有警衛駐守，然後又跑回隊伍中。帶頭者彼此交談了幾句，然後那些成年的便緊緊抓著那些未成年的，以防這些孩子們因為害怕而臨陣脫逃，並開始往街道的那一頭走去。

他們使用彎刀及棍棒，在醫院裡展開一場大屠殺。病患的尖叫聲驚醒四名在休息室裡小憩的警衛，警衛掏出配槍，槍聲劃破了寂靜的黑夜。二十分鐘後，警方搭乘一輛敞篷車抵達醫院，但立刻遭到埋伏在圍籬門邊兩名襲擊者開槍掃射。圍籬內，瘋狂的大屠殺則持續進行著。當地的軍營也派兵前來鎮暴，但是士兵們在衝往醫院入口處之前，便先在街上遭受突擊而失去了好幾名弟兄。士兵們經歷一場苦戰，直到黎明時分才掌控住局面。

這場屠殺事件的死亡人數，在翌日早晨的曙光中揭曉。醫院病房裡、外國醫護人員宿舍內以及醫院外的街道上，總共發現兩百一十八具屍體，死者多數是慘遭棍棒擊斃，或是被利刃砍殺身亡。還有許多人在這場事件中因為遭受攻擊而受傷，其中六名受傷程度不一的傷患，是遭到逮捕的行兇者。

這場屠殺事件的消息，已經透過手機傳送到世界各地，全球各地的新聞媒體爭相採訪當晚在鎮上被槍斃

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一樣，真正達到了「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的境地，連兒子婚宴這樣大的喜事都不能使他對之有片刻的忘情。但是非常不幸，大中先生在他的人生舞台上最後竟演出了一齣感人最深的悲劇。一九七五年，健康檢查發現了他的直腸癌已到了末期，割治無效，祇好節節待盡。不料劉夫人情深義重，決心伴他同行，於是兩人同時服大量安眠藥而死。劉氏夫婦雙雙自盡(double-suicide)是當時驚心動魄的一大新聞，不但美國、台灣、香港等地的媒體爭相傳播，歷久不息，而且《紐約時報》和康乃爾大學附近的地方報紙也作了相當詳細的報導。穎士寫了四首七律，以誌哀思，題為《悼念劉大中先生病逝夫人殉情之作》，前面所引的便是四首之二。

接著讓我談談穎士的詩詞創作。這部遺作所收詩詞，最早的寫在一九四三年，那時他可能還不滿十八歲。這些早年作品包括了各種體裁，如七絕、五絕、七律、五律、五古、七古等；而用詞遺字則不僅已臻熟練之境，且時有警策之句。所以早在一九四四年他的〈從軍行〉七古便已在《安徽日報》徵詩入選。一九五二年台灣大學徵詩，他以〈詩人節海上弔屈原〉五律六首榮獲首選，後來又取得《青年時報》「紀念詩人節徵詩特刊」舊詩組第一獎。由此可見，穎士在詩詞創作方面取得卓越的成績，絕非倖致。不但他的先天秉賦和後天功夫都超過同輩，而且這兩者的配合也恰到好處。

正由於穎士的生命本質首先是一位富於創造力的詩人，他和朋友們清談中最顯精采的也是有關詩的寫作。他在這一方面往往議論風生，使人有「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之感，尤其是在談到他自己的創作的時候。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一九七二年他從台北回來，告訴我們他寫了〈記蔣桂琴琴〉一首長詩。蔣桂琴是一位失去雙腿而靠義肢登臺的京劇名旦，但唱做俱佳，臺步尤見精妙。穎士詩中有「國步艱難如步履」等句，他追述寫詩時苦思冥索，終獲靈感的歷程，聞者無不動容。這是因為當時台灣剛剛退出聯合國，處境極為困難，他以「奴步」與「國步」互相映照，自然引起了讀者的共鳴。

穎士雖常常和朋友們談詩，甚至唱和，但我們從來沒有過詩社的組織。這主要因為穎士是唯一認真而又不斷寫詩的人。集中收了幾首他與勞延熹兄和我互相唱和之作，但都成於一九七二年以後，三人之中，穎士可以說是寫詩的原動力；其次延熹則家學深厚，與穎士共事於俄亥俄州立大學後，更是詩律日細，創作也日多。祇有我始終徘徊在宮牆之外，不過偶然興到，扮演一下張打油或胡釘鉸，為他們兩位增添一點熱鬧罷了。但重讀集中（第二輯）所收我們之間的唱和，一種溫馨的回憶卻在不知不覺中浮現於心。特別是一九七六年秋季，延熹來哈佛執教，恰好碰到了一個「多事之秋」，無論在公領域或我們生活周邊的私領域中都發生了一些重大的變故。延熹和我不肯放過這些百年難遇的詩料，因此寫了不少或莊或諧的作品。穎士雖不在劍橋，也通過郵遞參加了這一活動；現在收入集中的不過是存二、三於佰仟而已。其所以有此取捨，亦不難推知：蓋私領域中所詠，涉及人事，所謂「只堪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也。無論如何，集中三人唱和之作將我們當時一段興味盎然的生活保存了下來！

最後，我必須鄭重聲明：我愛重穎士的詩並不僅僅是從私人友情的角度著眼。事實上，這部《蠹餘集》是中國詩的傳統的延續；《集》中所收的詩始自抗日戰爭，中經內戰流亡，最後則歸宿於移居海外，恰恰是最近六、七十年中國歷史的流程（或向度）之一。因此循序誦讀全集，我們不僅陶然於詩藝之中，而且這一段有血有淚的真實歷史也在我們的心頭重演一過。此老杜之所以號稱「詩史」也。是為序。

驚醒卻不知發生何事的觀光客。該地區民政首長僅對外表示當晚發生一樁意外事件，但是並未透露任何相關細節。遭到逮捕的行兇者在軍醫院裡接受訊問，他們躺在染血的擔架上，宣稱自己是「聖靈解放軍」(The Lord's Resistance Army, LRA)的戰士，絲毫不在意公開他們的身分。該地區的軍隊指揮官對於他們的身分抱持懷疑的態度，因為聖靈解放軍的各項活動在近幾個月來早已受到鎮壓，而且這個團體的暴動範圍從來不曾遠離他們位於烏干達北部的核心位置。聖靈解放軍在烏干達、剛果與蘇丹三國交界處的叢林地區已經進行了長達三十年的恐怖活動，而馬辛迪的位置與該叢林地區相距超過一百英里，之前從未受過聖靈解放軍的攻擊擾。

然而，那幾個受了傷並且遭到逮捕的行兇者卻堅持他們的說法。即使負責訊問的人員為了逼他們說真話而毆打他們，他們仍舊不肯改口，似乎就是要讓政府當局明白，他們所說的句句屬實。那群人進行屠殺的方式，一如在他們當中有未成年者的事實，都與聖靈解放軍的一貫作風雷同。看來，聖靈解放軍選擇攻擊這個小鎮，就是為了要向烏干達政府宣告他們依舊活躍，而且比之前更加難纏。

次日確認了罹難者的身分。其中一百一十七名是醫院裡的病患，五十九名是醫護人員，二十四名為警察與士兵。其餘十八具屍體，則是發動這場屠殺攻擊的行兇者。

在五十九名亡故的醫護人員之中，有三十二名是美國公民。

……

亞美研究的翻譯、越界與扣連

一序《全球屬性，在地聲音》(上)

◎單德興

《亞美學刊》(Amerasia Journal) 於一九七〇年由耶魯大學大四學生唐·中西(Don T. Nakanishi)與陳觀榮(Lowell Chun-Hoon)於美國東岸的紐黑芬(New Haven)創辦，一九七一年在耶魯大學出版兩期之後，移至西岸的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亞美研究中心(Asian American Studies Cent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此後一直受到該中心的大力支持，至今已逾四十載，是此一領域中歷史最悠久、影響最深遠的刊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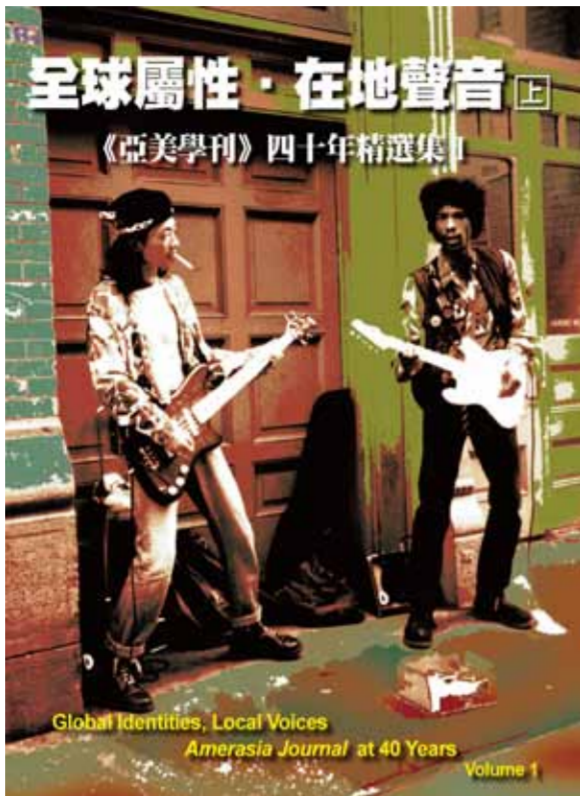
其實，亞美研究本身就是一種越界的思維與行動，因應一九六〇年代風起雲湧的民權運動，在種族、階級與性別的議題中，特別強調種族的因素。因此，《亞美學刊》創辦的宗旨，就是從亞裔美國人的立場，回應當時美國的民權運動，特色在於結合學術研究與社會/社區運動，內容不僅跨學門，涵蓋了人文與社會科學多種領域，也包括各種文類的文學作品，甚至納入了攝影及其他藝術，是一本獨具特色的跨學門綜合性學術期刊，至今約兩萬頁。

《亞美學刊》數十年來不僅在學術方面開疆闢土，引領風騷，帶動研究風氣，在社區營造與社會運動方面發揮了凝聚亞美社群的效應，促進世人對於多族裔美國社會的認識，在文學方面也具有提倡創作風氣、發展文學論述、考掘文學史料的作用，因而不僅在美國本身的族裔研究展現了獨特的效用，也在全球的亞美研究上扮演著領航者的角色。晚近為了順應知識經濟與網路化時代需求，全刊已經上網，影響更為深遠。簡言之，對於全世界從事亞美研究的學者而言，《亞美學刊》數十年來一直是最重要的刊物。而該刊近年來也積極與國際學者聯繫，尤其是加強與亞洲學者的交流與合作。此一翻譯計畫一方面希冀走出美國的框架，尋求與亞洲國家扣連，另一方面則力圖走出英文的框架，面對崛起中的中國與華文世界。

華文世界的亞美研究以往只是零星出現，如在歷史學和社會學等領域的論述，固然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然而畢竟僅限於少數專家學者。至於比較有系統的推動，可謂始於一九九〇年代初期，主要集中於文學，尤其是華美文學。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自一九九三年起，先後舉辦了三次華美文學國內研討會(「文化屬性與華裔美國文學」[1993]、「再現政治與華裔美國文學」[1995]、「創造傳統與華裔美國文學」[1997])，一次華美文學國際研討會(「Remapping Chinese America: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重繪華美國誌：華裔美國文學國際研討會，1999])，以及三次亞美暨亞英文學(Asian American and Asian British Literatures)國際研討會(「Negotiating the Past」[與去協商，2003]，「In the Shadows of Empires」[在帝國的陰影下，2008]，以及「War Memories」[戰爭記憶，2011])，引發了華文世界對於亞美文學，尤其是華美文學的濃厚興趣，對於亞美(文學)研究發揮了相當的啓迪與推波助瀾的作用。此外，自一九九〇年代初起，台灣學者也開始與美國的亞美研究學者保持密切聯繫，進行駐點研究，不時互訪，並參加彼此的會議，近年來更加與亞洲其他地區同行的交流。而中國大陸的學者也對此一領域展現了濃厚的興趣，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創辦北京外國語大學華裔美國文學研究中心的吳冰教授，推動華美文學研究不遺餘力，影響深遠，收入本書的吳文〈閱讀華美文學以了解美國、中國與華裔美國〉，顯示了以文學為借鏡的作用。

二〇〇九年七月《亞美學刊》資深編輯梁志英(Russell C. Leong)與我在南京參加一個華美文學國際研討會時，提到該刊即將邁入第四十年頭，有意進一步國際化，透過翻譯跨越英文的疆界，將四十年來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引進其他語文，徵詢我的意見，特別是翻譯成中文出版的意義與可能性。主要原因是亞美社群中，華裔為大宗，在歷史、社會、文學各方面的表現頗為突出，而且中文更是全球重要語系，使用人口高達十多億，可以此為跳板，進行其他語文的翻譯。

根據我多年從事亞美文學研究，以及在翻譯研究與實務上的經驗，深知這是華文世界難得一見的翻譯計畫與重大挑戰。除了因為《亞美學刊》的重要地位之外，其內容之多樣與討論之深入，對於任何有意從事翻譯的人都是艱鉅的使命，因此翻譯團隊的組成至為重要。



在與梁志英當面討論時，彼此都覺得這個計畫很有意義，但在執行上必須十分審慎，務期將亞美研究的國際頂尖期刊以最妥善的方式呈現給華文世界的讀者。兩人決定的翻譯作業基本原則為：優良譯者，學術專業，完整呈現。此後雙方多次透過電子郵件研商細節。梁志英自一九七七年起便主編《亞美學刊》(一直到二〇一〇年卸職)，熟諳其運作與內容，由他負責選文誠為不二人選，我則負責組織翻譯團隊並接洽出版。

梁志英初步決定選文之後，將作者、篇名及出處寄給我和中西，再由

我們提供意見。有鑒於華文世界的亞美研究者以文學學者居多，我建議上冊以文學研究與文學作品為重點，具有特色與代表性的其他選文則納入下冊。這個建議獲得他們採納，於是梁志英將選文分為兩冊，各冊再依不同主題分類。

梁志英與我初次商討時就提到這個翻譯計畫具有指標性的意義，譯文不得因為意識形態或其他因素而有所刪改。我也強調譯者最好是從事過相關研究而且具有翻譯經驗的學者。如此一來，可以從事本翻譯計畫的人其實並不多。再加上學術界多年來重研究、輕翻譯的現象，使得許多人對於從事翻譯——包括學術翻譯——裹足不前。所幸近二十年來台灣學界在亞美研究領域已經累積了一定的學術能量，再加上從事研究者主要在外文學門，大多具有相當的翻譯經驗。

於是根據上述原則邀請譯者，尤其是曾針對相關議題進行研究、甚至撰寫論文的學者，其中有些人還翻譯過專書，或者獲得國內具有代表性的翻譯獎項，相關資料詳見譯者簡介。譯者中有許多是我論學多年的同行，也有幾位是昔日的學生，如今在研究和翻譯方面已有相當成績。由於獲選者多為相關領域的學者，深知這個翻譯計畫意義重大，因此上冊的國內譯者在二〇一〇年元旦期間的四天內都回音表示接受邀請，下冊的國內譯者更是在兩天內全數同意，並紛紛表示很榮幸有機會參與這個華文世界的重要翻譯計畫。在此謹向本書多位譯者在繁重的研究與教學之餘，依然熱心投入這個獨具意義的翻譯計畫，表示最誠摯的謝意。

本翻譯計畫中，小部分為文學作品，大部分為論文或具有特殊意義的文章。文學作品的翻譯著重於風格的掌握與文采的呈現，有關作者及其作品的資訊與認知則是背景知識。論文或其他文章的翻譯涉及專業知識，需要以豐厚的學養為基礎，因為文章本身涉及深入的研究與思辨，必須對於背景知識有一定程度的掌握，才可能精準地翻譯，了解該文的特殊時空因素，在亞美研究中的歷史意義，在此選集中的意義，以及在華文世界可能具有的意義。至於其中涉及的考證，專有名詞的中譯或還原，在考驗著譯者的能力與耐心。有些譯者更與原作者直接聯繫，詢問細節，相互討論，務期將原作信實傳達給華文世界的讀者。

為了慎重起見，所有譯稿先經黃碧儀小姐逐字對照原文校讀，提出疑義或偶有疏漏之處，再由我逐字對照原文校讀，提供修訂建議，寄回給譯者確認。這種仔細審慎的作業方式，讓我回想起三十年前為《世界地理雜誌》校訂譯稿(當時就讀台大外文研究所的本書譯者之一陳淑卿就已是合作愉快的夥伴)，或一九九三年為《中外文學》校訂美國哲學大師羅遜(Richard Rorty)專號的情景，然而當年只是我一人校訂，也未與譯者互動，如今則更為審慎，務求周延，當然也就需要更多的耐心與毅力。無怪乎梁志英要以「太平洋黑珍珠」(「Pacific black pearl」)來形容這些譯者，以示其「珍奇稀罕，精緻細膩，鋒芒內斂卻又反映、折射世界，惟獨慧眼方能辨識。」他並且推崇「這個翻譯團隊構成了閃耀自台灣的跨國學術與文學的珍珠光串。」要從四十年刊登的數以千計的文章中挑選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呈現給華文世界的讀者，確實是件難事，因為既要再現亞美研究的多樣性，又要在彼此之間看出關聯，並引起華文世界的重視，希望能從中獲得知識與啓發，這個取向與目標顯見於梁志英序言的標題〈《亞美學刊》：連結亞美研究與華文世界〉。儘管如此仔細作業，譯文依然難免有疏漏之處，懇請讀者指正。

此書內容豐富多元，從梁志英以《亞美學刊》資深編輯的觀點所進行的規畫與命名便可以看出。上冊的五部分別為：全球屬性，在地聲音；歷史創造史家；文學為什麼重要；作家的世界；解放未來(Global Identities, Local Voices; History Creates Historians; Why Literature Matters; The Writers' World; To Free the Future)；下冊的四部分別為：連結與疆界；跨越種族與族裔；通往文學與性別之徑；美國華埠與文化(Linkages and Boundaries; Across Race and Ethnicity; Pathways to Literature and Gender; American Chinatowns and Cultures)。全書範圍廣闊，題材多樣，涉及文學批評、文化理論、文學創作與札記、日記、書信、歷史、自述、社會學、法律學、族裔研究、弱勢論述、性別研究、訪談、勞工史、華人離散(Chinese diaspora)、華文文學、攝影等。梁志英分別為兩冊撰寫序言，針對各部的重點加以提示，並予以綜合性的觀察。作者則包括了華裔、日裔、韓裔、菲裔、薩摩亞裔、柬埔寨裔、赫蒙裔、土耳其裔等多種亞裔美國人，太平洋彼岸的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學者，甚至還有孟加拉攝影師、波蘭學者……提供了各式各樣的觀點。就語文而言，除了主要是英文著作之外，也有少數本來是中文之作，翻譯成英文發表於《亞美學刊》，此番再以原文呈現於本書(如譚雅倫(Marlon K. Hom)原先英譯的溫泉之文)，顯示了語言之間的轉換，並方便讀者依據不同的脈絡加以解讀。

對於華文世界的讀者，這些豐富多元的內容適足以開拓視野與胸襟。一般說來，由於語文與訓練的緣故，華文世界從事亞美研究者主要集中於文學，尤其是華美文學，這種情況在海峽兩岸皆然。然而亞美研究自有其歷史與文化脈絡，只從文學角度來看固然有其意義及獨特之處，總歸不免偏狹之嫌。因此，華文世界的亞美文學學者閱讀本書，不僅是看其中的文學創作、文學評論與文化批判，更可以跨學門、跨地域的全球視野，特別是華人離散的角度來看待，將華美/亞美文學放在更寬廣的脈絡，甚至使得原先習以為常的作家，如張愛玲，因為不同的脈絡化的方式而讀出新意。

如前所述，《亞美學刊》自創刊以來便從亞裔美國人的角度出發，力求以學術介入社會，引領研究與社會風氣，在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亞美研究中心，尤其是多年擔任該中心主任的成露茜(Lucie Cheng)的大力支持下，積極探討相關議題，開拓研究領域，對於亞美研究在美國以及全球的發展上往往能開風氣之先，其中一些文章更成為亞美研究的經典之作，在翻譯成中文之後，對於華文世界也將會有一定程度的啓發與借鏡。

因此，《全球屬性，在地聲音》的出版具有底下多重意義。首先，雖然《亞美學刊》近來也注意到英文世界以外的學術社群，並積極聯繫，邀請以英文撰稿，但是此翻譯計畫是首度以專書形式以英文以外的語文出版，代表了該刊在全球化時代的跨國轉向，積極尋求跨越太平洋，進入另一個重要語境，並企盼獲得迴響。

其次，在該刊四十年的悠久歲月中，梁志英負責編務長達三十多年，主導走向，對其中大小事務(包括各篇的背景與迴響)瞭若指掌，由他負責選文，當最能忠實呈現該刊的特色與強項。如梁志英曾面告筆者，黃秀玲(Sau-ling C. Wong)的〈去國家化之再探：理論十字路口的亞美文化批評〉(「Denationalization Reconsidered: Asian American Cultural Criticism at a Theoretical Crossroads」)與高木丹娜(Dana Takagi)的〈處女航：航向亞裔美國的性取向與認同政治〉(「Maiden Voyage: Excursion into Sexuality and Identity Politics in Asian America」)，在美國是最常被要求授權收入讀本或教材的兩篇，此次也收錄於本書，供華文讀者參考。

第三，若干具有先見之明的雙語亞美人士，如麥禮謙(Him Mark Lai)和岡田雄二(Yuji Ichioka)，都強調亞洲語文對於亞美研究的重要。身為歷史學家的他們，重視亞洲語文的資料與檔案，將其多年觀察與經驗翻譯成華文，進入亞洲語境，稱得上是某種形式的回歸與反響。至於黃秀玲有關華文文學的探討，既擴大了亞美研究的範圍，也讓華文世界的讀者注意到這些在美國的華文創作，進而將其納入世界華文文學的範疇。尤其是原先以中文發表，在《亞美學刊》上譯介給英文世界的文章，如今藉此機會再度跨回華文世界，兩度跨越不同時空與語境，在不同的脈絡中衍生的新意也值得觀察。而李亮疇(Bill Lann Lee)對於容閔(Yung Wing)的研究，黃秀玲、譚雅倫對於華文文學的強調，張少書(Gordon H. Chang)有關「千面堅夫」的生平與作品的考掘，王靈智(L. Ling-chi Wang)對於華人離散的重視，都與此雙語文、雙文化的背景息息相關。

第四，數量更多且同樣值得觀察的，是原先以英文撰寫、發表，而此番首度以中文出現的文本。這些論述與創作進入華文世界，讓無法閱讀原文的讀者可以一窺

亞美研究的繁複面貌，連同上述的華文作品，一併納入梁志英在上冊序言中所指出的亞美研究與華人世界的五種連結：1 多族裔建國，2 有關種族關係的觀點，3 移民與定居，4 美中關係，5 課程變革。至於進一步的內容，可參閱梁志英為兩冊所撰寫的簡介。

第五，台灣和中國大陸的亞美研究，由於外文學門語文之便，研究者多為文學學者，而且大多集中於華美文學。此書為順應華文語境，在不同學科之中，所收錄的文學作品、批評與文化理論比例較高，而且超越華美文學的界限，展現了亞美文學的多樣性，也顯示《亞美學刊》藉由文學與相關論述拓展視野的策略，這些作品與論述都具有相當的代表性。相較於論述，文學作品更容易為讀者所接納。本書由於篇幅所限，只能收錄較短的作品，但依然努力呈現亞裔美國的多元特色。

第六，雖然台灣和中國大陸的亞美研究者多集中於文學，然而此一領域既然與亞美社群息息相關，因而涉及此社群的多種面向。本書從四十年的學刊中精選出不同學門的代表性文本，如有關歷史、社會、政治的論述，不僅可以開拓華文學者與讀者的視野，對於專攻華美文學的學者而言，也提供了更寬廣的歷史、社會、政治與文化脈絡，協助他們定位華美文學，深切體會到文學，尤其是族裔文學，並非孤立於社會、政治與文化之外，而是密切相關的。

第七，由於全書是來自四十年的選文，因此各篇刊登的年代便值得注意。若能以歷史化的眼光來閱讀不同的作品，當更能領會亞美研究作為一個學科或跨學門的研究領域的發展，以及其中若干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作品。如韓裔美國批評家金惠經(Elaine H. Kim)一九八一年討論華裔女作家湯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之文，發表於她的里程碑之作《亞美文學作品介紹及其社會脈絡》(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前一年，預示了亞美文學研究的興與，以及華美文學在其中所佔的地位。

第八，除了少數作家提供的簡介之外，梁志英特地為每位作者撰寫簡介，這些連同在各篇文本之前註明的原出處及選文出版當時的作者簡介，讓讀者更能將文本連結上作者的經驗、生平與學思歷程，體認族裔人士的所思所感、所作所為都難以擺脫個人與族裔的影響，以及與主流社群的關係，呈現「個人的就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the political」)，多少發揮讀書、知人、論世的作用。而有些譯者與作者藉由此一翻譯計畫彼此聯絡，建立起新的網絡。如聖·瓊(E. San Juan, Jr.)為傅士珍·熊葩(Pa Xiong)為蘇格解釋若干專有名詞。張少書為張錦忠提供林堅夫的詩作影本與歷史背景。賽法·艾納(Sefa Aina)與黃心雅發現彼此對於太平洋島民的共同興趣。沙悉都·阿蘭(Shahidul Alam)不僅與陳淑卿聯絡，筆者也與他在中央研究院相見，得知他在台灣的一些亞美研究之外的人際與學術網絡。更特別的是成露茜，本書編譯期間，她病逝於台北，因此特別收錄了她早年與中國學者合著的論文，以及豐田曉(Tritia Toyota)的紀念文章，讓讀者認識出身台灣的她，如何在美國學界奮力打造出一片天地，並致力於跨國學術合作。

第九，作者及其作品的再現固然重要，但若無譯者，華文讀者難以閱讀外文資料，重視文采的文學作品以及重視研究的論述更是如此。本書譯者不只學有專精，並有翻譯經驗，翻譯的多為已有鑽研或涉獵之領域，必要時加上譯注，以協助華文讀者進一步了解原作，有些地方可能比直接閱讀原文的讀者更為深入。所附的譯者簡介彰顯這些幕後英雄的專長，使其現身，矯正一般對於譯者的輕忽以及視而不見，而強調譯者作為語言轉換者、知識傳播者以及文化中介者的重要角色。簡言之，這些譯者藉由翻譯這些亞美研究之作，以個人專長成為知識生產、學術介入與社會參與的一環。

此書以複數的「全球屬性，在地聲音」命名，正是強調在全球化的今天，屬性已然多元，在地也已眾聲喧嘩，而全球與在地之間的互動更是複雜多變，亞美研究已不再限定於美國的亞裔，更要透過各種扣連來建立新的可能性。而本書上下冊分為各部，只是權宜之計，以收綱舉目張之效，方便讀者初步的了解與掌握，然而在此也要強調各部之間的動態關係，檢視在相互的滲透與作用之中，尤其是在譯介入華文世界之後，可能產生什麼迴響與效應。

本書能以現在的面貌問世，首先要感謝梁志英和中西，兩人高遠的視野與廣闊的胸襟，數十年來引領亞美研究勇往邁進，為學術與社群運動之結合建立了典範，並且藉由此一計畫，讓《亞美學刊》四十年來的精華得以呈現於華文世界。梁志英精選文章，仔細編排，協助與作者接洽諸多事宜(包括授權)，撰寫作者簡介與兩冊之序言，備極辛勞。沒有他的大力奉獻，本書無法以目前面貌出現於華文世界。此學刊的創辦者中西的協助、合作與鼓勵，也是本書面世的重要原因。其中包括於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的電郵中，確認他的日文姓氏是「中西」，而「Amerasia Journal」就創立宗旨、內容與歷史而言，中譯為「亞美學刊」(而不是英文字面順序的「美亞學刊」)，更符合創刊的宗旨、發展與內容。因此，全書就此加以統一。此外，也是透過中西聯繫上《亞美學刊》的合創者Lowell Chun-Hoon，並確定其中文名為「陳觀榮」。

金融海嘯過去了嗎？

——《金融大崩盤》譯後記

◎陳正杰

還記得在記者生涯剛開始的時候，一位美國外交官跟我說明美國和台灣經濟制度上的一個重大差異。他說，台灣有太多的限制，這個不行，那個不准；基本上任何事必須是法令允許的，當局才不會干涉。他說：「我們正好相反，除非法令禁止，基本上都可以做。」

後來我才明白，這位外交官說的，是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概念：政府少管事，讓市場自由競爭，最能發揮規範與調節功能的不是法令和官僚體系，而是市場本身。

解除法令和官僚的限制，讓有創業精神的人有充分的自由可以發揮，非但如此，政府還要設法協助，讓創業者更容易取得資金，讓民眾更容易貸款買到房屋（能否保住工作與還款能力是另一回事），龐大的國有企業既無效率又有工會的問題，不必了，全部民營化！

從1980年代的雷根總統和柴契爾夫人時代起，新自由主義在日益格魯撒克遜經濟體為主的許多國家發揚光大，看似造就了全球經濟的榮景，但卻是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和今天一波接一波歐債危機的遠因。

雷根和柴契爾夫人不是創立新自由主義的人。他們只是擁抱這樣的意識形態，讓它在後冷戰時代發揚光大。蘇聯解體之後，日裔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 在1992年的著作中說，全球普遍採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場資本主義，可能代表人類已經找到終極的政府制度，人類社會文化演進已經到了終點。

這是何等的信心！它反映了當時西方民主政府的興奮之情。他們自認站在歷史正確的一方，西方民主與市場經濟制度將會推行到全世界，勢如破竹。

但事實顯然並非如此，福山1995年就修正他的說法，2011年更為他在將近二十年之前的預測道歉。邱吉爾說得對：「民主是最糟的政治制度，除了其他各種已經嘗試過的之外。」重點是，民主只是「幾害相權，取其輕者」，如果失去制衡，特別是如果放任人性，民主這個制度也可以成為殘害社會與百姓的工具。

政治制度如此，金融體系也是一樣。權力使人腐化，金錢何嘗不是如此？這本書以「告別貪婪的時代」為副標題是過於樂觀，但它點出了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的一個根源：不受節制的貪婪。

21世紀初期，美國各銀行和專營房貸的公司明知有些民眾還款能力有疑慮，為何還要鼓勵他們貸款買房？因為這種高風險的貸款可以包裝成債券，來吸引追求高

獲利的投資者。

如此一來，金融機構不僅可以向申請次級房貸的民眾收取高於正常貸款的利率，還可以把他們擔負的債務賣給第三者，即使買屋民眾無力還款，金融機構還是可以賺錢。問題是，這類稱為擔保債權憑證的衍生性商品風險如何在，沒有人真的清楚。只要有錢賺，恐怕也不是很多人在乎。

事實是，多家金融機構不惜用會計手法隱藏債務，欺騙投資人，直到真相無法掩蓋。

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個市場上訂單減少，就會影響到許多其他地方的生產。美國陷入金融危機，歐洲不可能不受衝擊。作者認為，次貸危機爆發後，從2009年3月美英政府採取量化寬鬆到2010年6月是全球經濟危機的第二階段，隨之而來的第三階段，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處的局面：雙重衰退，部份國家出現通貨緊縮的螺旋，各國可能採取競爭性的拯救經濟方案，使全球化前功盡棄。

作者說，在這危機的第三階段，是要付出代價的時

只說時間

◎汪建輝

有些故事全部都是真實的。有些故事則全部是虛構的。我小說裏的故事則是「一半一半」。一半真實，一半虛構。哪些是真實的？哪些是虛構的？

這也許會成為小說讀者關心的問題。因為猜到真實的事情，總會讓人有揭開謎底的興奮。謎，並不是那麼好猜的。否則這個謎將毫無價值。相反，謎如果太難了，大多數人也會失去猜它的興趣。

放棄，是這個世界最輕鬆的生活態度。聰明的人用放棄來解放自己。

為了讓讀者不放棄，我想出了一個辦法，就是告訴你們其中的一個故事裏的真與假。這樣，只要順著這個思路，就可以猜測出其他的故事中哪一半是真實的、哪一半是虛構的。

請注意下面的文字，只說時間（可對照小說《詩的時間》來閱讀）。

上個世紀八〇年代末。我出遠門，去拜訪一位詩友。那是一個小縣城，古老的建築已經被破壞完了，只留下一條亂搭亂建而形成的全新的破敗巷子。排水溝不暢，到處是積水，積水的邊上是稀稀的泥濘，再遠一些就是細細的塵土。只要從街頭走到街尾，即使是剛擦亮的皮鞋也會蒙上厚厚的一層灰塵。辨不清真實的顏色。

就在巷子的中間，應該是黃金地段，有一個修錶攤。攤主是一個看起來比我大二、三歲的男子。進朋友的家門與出朋友家門都要看到他。

那一次，在朋友家大約住了五天。這五天裏我發現這個修錶人的作息時間極不穩定。熟悉他的朋友對我解釋說：這個人，每天只賺五元錢，什麼時間賺到了五元，就什麼時候收攤回家。

當時，我也年輕，只覺得這個人很瀟灑。心裏有些喜歡他。於是，就默默地記下了這個人的模樣。清秀、長髮、衣服陳舊但又乾淨。少許的鬍鬚透露出骨子裏的一點男人味。

這個形象在我的腦海裏浮動了好久。隨著時間慢慢地沉沒著。

每當他就要徹底沉沒消失之時，上漲的物價又會如一個救生圈一樣將他托了起來。描繪出來的形象就像是溺水者在海面上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看著那要命的模樣，我就會想：五元錢應該不夠他用了。他要不然就死去，要不然就要提高標準再多賺一些錢。

一個瀟灑之人在我的眼中漸漸地沉重了起來。這個脫俗的人變得禿頭、骯髒，而鬍子拉扎。日夜將不停地工作？

時間還在遠行。在我的國家，物價還像漲潮一樣不停息地上漲。緊抓著救命稻草的人的所處的環境越來越危險。

眼前的這個人命運究竟怎樣？每當我看到物價上漲的標籤，就會莫名地為那個遙

時間的重量

汪建輝

遠的地方遙遠的時間中的修錶人擔憂。一是擔心他吃不起飯餓死，二是擔心他拼命地工作而失去了過去我所欣賞的那種瀟灑。

那樣活著還有什麼意思？在我的心裏，修錶人活著還不如死去。儘管現實中大家都認同「好死不如賴活著」，可是在理想之中，我還是幻想著一個純粹的形象。以最為乾淨、最為簡單的方式生存著。僅僅只是為了活命。活著的目的不也就是這樣嗎？將時間用完之後兩手空空地離去。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憂慮，竟壓得我快樂不起來了。得承認，我不是一個聰明的人，沒有辦法「放棄」那個在生存中越來越難生存下

去的修錶人。由這個社會的發展走勢，可以斷定他會活得很窩囊。悲劇地成為市井的談資、笑柄。

於是，我決定要殺死這個修錶的人。從此把他從我的思緒裏抹去。我拿起了小說，將他編進我的故事裡。我對他說：你就叫「時間」吧！我會讓你愛上一個人。而後，用愛情殺死你。

我對他說：對不起。為了減輕我的負罪感，我選擇「愛情」為兇器殺死了你。這可是我能找到的這個世界上最幸福的一種死法。

在小說裡，作者是一個最大的獨裁者。他要誰死，誰必定得死。他讓天上掉下一記金子砸中誰，就會砸中誰。一切全憑作者對這個世界的理解。愛與恨，鏡像著這個世界另一端的真相。

時間，你會原諒我嗎？時間之中，時間終究要死去。時間一死，我也就沒有什麼可牽掛的了。

2012年2月29日於成都翡翠城家中

我們的時代寓言

——《墨西哥的五個太陽》

◎林風

對古代墨西哥來說，第一個太陽是水；第二個是土地；第三個是火；第四個是風。而第五個是我們，它註定要消失，但時候未到。

卡洛斯·富安蒂斯（Carlos Fuentes）

曾有記者問墨西哥當世最重要的小說家、散文家兼評論家卡洛斯·富安蒂斯（Carlos Fuentes）：墨西哥的歷史是如何開始的？對這個提問，富安蒂斯說他感到有點茫然。這種茫然或許因為墨西哥太悠久的歷史，和太多元的種族文化，難以用簡單的話語回答，也許因此觸動他用鴻篇鉅製的著作，《墨西哥的五個太陽》，來嚴肅回答關於國家形成的歷史大哉問。



國家歷史，節奏明快，動人心弦。富安蒂斯借來古老墨西哥的五個太陽神話（水、土、火、風和太陽），開啓壯闊的敘述場面，讓神話中天時的遞衍，五個太陽宿命般的興替，成為墨西哥歷史舞台上戰禍不斷的最佳註解，使作品顯出史詩般的悲壯；而語言敘述的多角度，多聲部，更讓作品炫麗燦爛，肌理豐富。正如本書原文書介所說：卡洛斯·富安蒂斯富有創造力的想像，使他的歷史小說達到一種深刻雋永的寫實程度，克里奧爾人、印第安人、外來殖民，不論是受害者，還是施害者，暴君還是革命者，他們的聲音在這本書中響著，這是一種迫切的聲音，無所顧忌的聲音。

是的，無所顧忌的聲音。這部迥異於一般講述國家起源的著作，以土地的角度重新書寫各種族裔勢力，在墨西哥廣袤大地上所展開的開拓、殺戮、征服、掠奪、強暴、繁衍的血腥歷史，令人動容。天上是五個太陽相繼輪替的神話，地上是一個新西班牙國家的漸次形成，二條線，相互頹頹，而後一起面臨最後一個太陽紀元，新墨西哥的時代。人類的歷史進程，無獨有偶，西元1518年從西班牙出發尋找黃金的艦隊發現美洲大陸，以及馬雅人的墨西哥，在同一個世紀稍晚的1580年代，西班牙人也同樣發現福爾摩沙台灣；歷史的機遇，若相契合。在這個太平洋另側的島嶼上，南島語族開始面臨屠戮、清洗、和異化的命運——墨西哥的歷史似陌生而實不陌生。讀完這本精彩絕倫的千禧年回憶錄，相信也可同步追索台灣過去未來的命運，就像富安蒂斯所說：誕生、死亡和新來臨的傳承深植在墨西哥的精神。當我們記得我們曾經為何，我們才能創造一個不會讓我們迷失的未來。這就是我們的時代，就是當下。一個屬於墨西哥第五個太陽的關鍵時刻。

文見《世界文學·「空間與身體」》

這種根源性的疑惑，和國家身分的追尋，密不可分，也和作家畢生的終極關懷，緊緊相扣。富安蒂斯採另一種視角，藉著從土地的思維出發，來作回答的引子：是不是當墨西哥大地上長起第一株玉米苗時，「墨西哥」的歷史就開始了？真是正典。植物本就是土地的先驅斥候，從土地的被發現，開拓，到殖民勢力的入侵，與反殖民的革命，來說明一個國家的形成，恰好可以描述墨西哥從前殖民到後殖民以迄於今天的國家形成。這位拉美文學爆炸時期的大文豪，捨棄了長篇小說的架構，別開書寫新局，夾敘夾議，出入虛擬與歷史想像，在西元2000年推出這部橫空出世的作品，《墨西哥的五個太陽》，副題「千禧年的回憶錄」，讓人驚艷。

這部包含〈序〉在內，由二十五篇長短不一的篇章構成一個全新文本的著作，幾乎包含了富安蒂斯從年輕到千禧年前，不同階段的創作，他本人從十部作品 包括《戴面具的日子》，《最明淨的地區》，以及1962年贏得國際性聲譽的《阿爾特米奧·克魯斯之死》等一節選出所需主文，重新編整，賦予新的靈魂，架構出歷史的敘述，氣勢逼人。這部驚世之作難以單純的文類目之，它既像小說，又雜採散文，講稿，議論等文類，十分多樣。藉個人的創作書寫，以墨西哥為主訴中軸，貫串並編織出千年的

時間的重量

關於作者

汪建輝，1966年生，男。獨立中文筆會會員。出生後一直生活在福建省中部的一個小城。1988年初辭職到北京編輯一份民間的文學報刊，一年後遇到了「六四」運動。同年六月底離開北京，後在安徽省宿松縣被捕，並被以「反革命煽動罪」由勞教一年。作品因審查制度，極少出版。多數通過自己印刷在地下流傳。2009年，獲得「自由寫作獎」。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中國地圖》、《十四年》、《廣場是個筐》、《語言是歷史的必然對稱》等。